

丁仲礼
王晓东
叶健勇
孙小青
李立新
李曙白
陈大柔
洪 钢

著

绝代回眸

——七七、七八级大学生八人行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人民出版社

丁仲礼
王晓东
叶健勇
孙小青
李立新
李曙白
陈大柔
洪 钢

著

绝代回眸

——七七、七八级大学生八人行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绝代回眸：七七、七八级大学生八人行 / 丁仲礼等著.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11

ISBN 978-7-213-08927-5

I. ①绝… II. ①丁…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13984号

绝代回眸

——七七、七八级大学生八人行

丁仲礼 王晓东 叶健勇 孙小青 著
李立新 李曙白 陈大柔 洪钢

出版发行：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集团网址：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http://www.zjcb.com>

责任编辑：洪晓

责任校对：陈春 张志疆

封面设计：大漠照排

电脑制版：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杭州丰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16.25

字数：245千字 插页：4

版次：2018年11月第1版 印次：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213-08927-5

定价：4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 STAR 编委在西湖无名岛上野餐（摄于1980年元旦）



◎ 《求是园》部分成员合影（摄于1981年）



◎ 《求是园》成员合影，从左至右分别为：洪钢、丁仲礼、叶健勇、王晓东、龚慧宏、孙小青（摄于1981年）



● 陶松锐老师（中）、王
晓东（右一）、叶健勇（左一）
和校团委成员在苏州

● 陶松锐老师（右
二）、孙小青（右一）和书
画社成员在楼外楼合影



● 雪后在植物园合影，左
一为李立新，右一为洪钢

● 同学合影，从左至右：
陈统志、洪钢、傅明辉、李
哲、叶健勇



● 云游天目山，从左至右：孙
小青、王晓东、罗爱琳、洪钢、龚
辉宏、刘丹

● 在西湖边，从左至右：
叶健勇、洪钢、孙小青、丁仲
礼、陶松锐老师





● 洪钢、李立新、陶老师、丁仲礼（从左至右）在西湖画舫上



● 重聚浙大（摄于2003年4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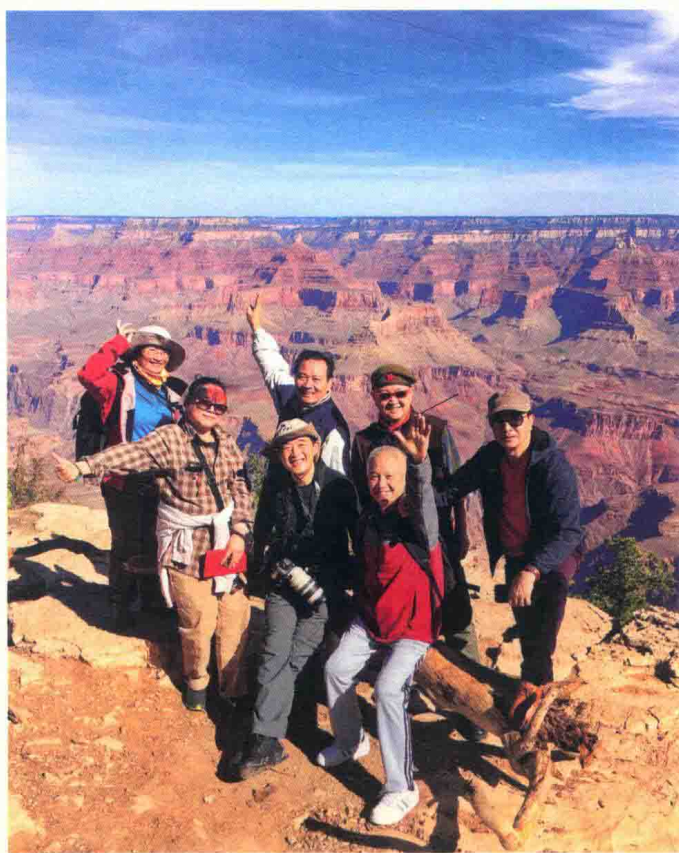
在莫干山裸心谷畅饮，从左至右：叶健勇、王晓东、李曙白、孙小青、洪钢（摄于2016年6月）



浙江大学校庆120周年期间，老书记张浚生与《求是园》成员共聚（摄于2017年5月）



● 校庆120周年期间合影，从左至右：洪钢、陈大柔、田锻、孙小青、丁仲礼、沈音、汪荣勋（摄于2017年5月）



● 在美国大峡谷
（摄于2017年9月）

序 | 咀嚼历史 体味人生

张浚生

10月,丁仲礼同学给我来信说,他们几位浙江大学七七、七八级同学各自写一篇文章结集为《绝代回眸——七七、七八级大学生八人行》准备正式出版,以纪念恢复高考制度40周年,要我为该书作一篇序言。丁仲礼现在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大学(国科大)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我之所以称他为同学,是因为他当年在浙江大学本科学习时,我先后担任浙江大学党委常委(1978年)和党委副书记(1980年),分管学生工作,与他们在学校时的一些活动有直接联系。我认为出这样一本书很有意义,遂欣然答应。

收到来信后不久,他们送来书稿时我正因患肺炎并影响心脏功能住院治疗。在病房里我认真阅读了他们各自写的文章,在阅读过程中心情十分激动且浮想联翩。尽管这是他们各自写的文章,风格不同,但是都比较详细地记录了他们当年的成长历程,其中包含了我国一个时代的气息。他们八个人家庭环境不同,经历也不同,但都带着那个时代的烙印,能从一些具体事件中反映历史。

历史潮流,滚滚向前,永不停息。在进程中既有明媚的阳光与坦途,也有狂风骤雨与高山险阻。通常说我们的国家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超过3000年。其实语言早于文字,文字也是逐步形成和完善的。没有文字之前,文明早已存在,同样也是逐步成长和完善的。没有文字之前的文明是通过口口相传、用简单的符号和图案记录下来的。所以我国的文明史,究竟起于何时,还需要继续深入地探究。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中国文明史连绵不绝、从未中断是不用怀疑的。在这连绵不断的历史中,按照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所著《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

纪》中所说，“中国文明的特点是聚合和连续”，中国即使受到外邦的侵入，但是“入侵者自己总是被迅速、完全地中国化”。里阿诺斯认为，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三次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大革命：第一次发生于公元前 221 年，它结束了领主封建制，创立了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帝国；第二次发生于 1911 年，它结束了帝国，建立了共和国；第三次发生在 1949 年，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政权。

我之所以把话题拉向这里，主要是因为本书的几位作者的文章，虽然是叙述了他们人生经历中一个小小的片段，但也同样是在叙述历史。这就引发了我们如何来咀嚼这一段历史的问题。中华民族有着绵延数千年的光辉灿烂的历史，但是也有几百年的落后史，特别是在近代历尽磨难，饱受欺凌。但是中华民族从来都没有屈服、没有倒下。近代以来，经过几代人前仆后继的艰苦奋斗，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现在强起来的巨大飞跃。但是这个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本书的作者们因各自生活环境不同，每个人都经受了不同程度的锻炼和考验，或者是因为家庭的贫穷，或者是因为当时“左”的错误政策的影响等，但他们最终都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握住了时代变化的脉搏，脱颖而出，各自创造了自己的人生辉煌。正如陈大柔在文章中所说：“线是由点组成的。人生路上若干个‘偶然’通向必然的彼岸。谁能在‘偶然’的转折点上把握好，谁就成了自己命运的主宰。”也正如李立新所说：人生有如爬山，可以体验一个完整的过程，走完了人生半程的人都能体会，痛苦、欢乐和未知的诱惑……也正如叶健勇在文章中所说：“遇事先别灰心，试试看能否找到打开烦恼的钥匙。而这钥匙，一定是有的。”他们就是抱着这种乐观的心态，最终找到打开烦恼的钥匙。

1977 年，全国恢复中断了 11 年的高考制度，高等学校通过考试招收新生。这是邓小平同志复出后主持科技、教育工作力推的一项重大举措。40 年之后回头再看，这一举措对我们国家在经历动乱之后恢复经济建设，以及整个民族开始重新尊崇科学与文化、科教兴国等方面而言，其意义怎么高度评价都不过分。“这一年的高考承载了一个民族殷切的希望。”王晓东的切身体会，说出了所有人的心声。许多年后，李曙白还在他的诗歌《在餐桌上说起小平》中，表达了他，也是他们这一代人对邓小平同志拨乱反正、给予他们在改变自身命运的同时获得报效祖国机会的感激之情。

七七、七八级是在非常历史时期入学的两届大学生。一方面,被“文化大革命”耽误的众多的年轻学子们怀抱梦想涌入考场,历届生加应届生共13届应试者中,只有佼佼者才能如愿进入大学殿堂。尤其是七七级,是恢复高考第一年,竞争尤为激烈。另一方面,一大批经历过社会大舞台历练的青年,在入学之后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他们渴求知识,刻苦学习,同时勇于思考和实践,也给大学带来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正如王晓东文中所说:“学生以天下为己任,有很强的时代责任感和参与意识。”“深感时不我待,一心想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早日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老和山下,植物园中,见到的都是苦读学子。教学楼自习室爆满是平常之事。即使是食堂打饭排队的一点时间,也要拿出单词卡片背一背。”正因为如此,这两届大学生毕业之后成才率也特别高。当年写下诗歌《啊,造山时期》的丁仲礼,怀揣着为国家、为民族“造山”的梦想,孜孜以求,奋斗数十年,为我国的地质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本书的其他几位作者,也都在各自的领域,为国家、为社会做出了突出的成绩。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正是由千千万万名如这八位作者一样的建设者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每个人都做出过贡献。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①

本书的八名作者,来自浙江大学的不同专业,他们结缘于一本学生刊物《求是园》。浙江大学作为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现代高等学校之一,其源头可以追溯到1897年在维新变革浪潮中创建于杭州的求是书院。学校又在长期办学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求是”校风,因此,“求是园”几乎就是浙江大学的别称。这些同学都读理工科,但有些在进入大学之前,在社会跌打滚爬中,就已经开始了写作生涯;有些虽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但也自幼喜好文学,深受熏陶,因此,他们都具有一定的文学修养。不管是他们当年所作的文章,还是在本书中对人生经历的叙述,都文采斐然,具有可读性。相信有兴趣的读者,读完这本书之后会有很多的收益。

《求是园》创办时,我曾经专门写过一篇短文《祝求是园内百花盛开》,刊

^① 鲁迅:《鲁迅经典全集》(下),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773页。

登在创刊号上。“浙江大学无论在解放前或解放后,都培养了不少我国科技文化工作中的佼佼者,素以‘求是、刻苦’的学风和艰苦创业的校风立于我国学界之林。珍惜我们过去的历史,是为了继承其良好的、有益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办学经验和办学传统,在已经取得成绩的基础上,沿着社会主义轨道继续前进。”通过这本书,我很高兴地看到,这八位同学毕业之后,都始终坚持浙江大学的优良传统,通过踏踏实实的工作,为国家建功立业。如今,他们有的还在工作岗位上,有的已经退休,但仍在为社会做贡献。他们从未松懈过对梦想的追求,也从未辜负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正如丁仲礼在文章中最后所说:“我可以对母校问心无愧地说一句:不管我工作做得好不好,至少我从来没有忘记过浙大的校训!”作为他们曾经的老师,我为他们骄傲。

谨以此为序。

2017年12月

本书缘起

王晓东



▲ 部分《求是园》杂志



▲ 《求是园》创刊号封二及目录



1977年，春风初度，百废待兴。邓小平同志力挽狂澜，做出了恢复高考的决定，首次突破“两个凡是”，政治影响极其深远。恢复高考，承载了一个民族殷切的希望：平等竞争，择优录取。恢复高考，实现了千万考生多年的梦想：学习求知，改变命运。恢复高考不仅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也为神州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从历史的角度看，恢复高考更是促进了社会阶层合理流动，为社会公平长治久安打下了坚实基础。

本书的八名作者结缘于“求是园”（浙江大学因1897年创办以来延续至今的求是学风而有“求是园”别称），多为校团委《求是园》编辑部成员。当年浙江大学只有理工科系，而我们是理工重镇的“文青”。“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

道”。在浙江大学求学,创办《求是园》,开拓了我们的思想境界,提高了我们的能力素养,为大家后来在各自领域有所建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值此恢复高考40周年之际,我们愿将入学前后的经历记录下来,与大家分享记忆中的“吉光片羽”。

书名定为《绝代回眸——七七、七八级大学生八人行》,首先是因为七七、七八级大学生是非常特殊的一群人。当年高考报考人数空前,多年来累积的历届生加应届生共13届学生,竞争空前激烈。考生大多在社会蹉跎多年,经历丰富坎坷。同学们年龄跨度之大亦堪称奇观,以我们这八人为例,年纪最大的李曙白,入学时年近30岁,是“老三届”的高中生;最小的叶健勇,是1978年的应届生。这两级的许多同学日后成为社会中坚骨干乃至国之栋梁,究其原因,首先是“江山代有人才出”。“十年动乱”,大浪淘沙。多年累积的学子如“地震形成之堰塞湖”,人才济济,汇聚一时;一朝决堤,浩浩荡荡。

“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经过广阔天地多年艰辛磨炼的这批学生,对祖辈生息的这片土地爱得格外深沉,对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格外珍惜。生活的艰辛,让我们对美好前程分外向往。经动荡社会看世态炎凉,使我们对自由公正充满憧憬。大家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学习自觉刻苦。毕业时恰遇国家百废待兴,大量岗位人才奇缺,为我们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广阔舞台。海阔鱼跃,天高鸟飞。生逢盛世,何其幸哉!

经过《求是园》历练的这个群体,可谓人才辈出:党政高干、教授院士、诗人作家、科研骨干、工商巨子、雅士高人,群英荟萃,各擅胜场。推本溯源,事出有因:学生干部锻炼活动能力;写作编辑提高表达能力。编辑部诸位既是理工生,注重理性严谨,又擅长文笔,善于思辨沟通。因此,走上工作岗位,自然如鱼得水。由此可见:文理兼修,全面发展,确实是培养领军人物的重要一环。

我们入学的1978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元年。年初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新宪法,设定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提出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光明日报》刊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开启了思想解放运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更具有深刻而长远的

影响。民间自发的文化启蒙,也乘思想解放东风,从事开启民智的耕耘。我们一群志同道合的浙大学生自办的杂志 *STAR*,就在这时应运而生。从热物理系的星星之火,到轰动全校的正式发行,*STAR* 聚集了一批满腔热血的有志青年。洪钢高屋建瓴的政论,大柔笔力雄健的发刊词,仲礼的诗作,健勇的小说,以及我的散文,各有知音拥趸。而立新募款印装,自是功不可没。

阳春三月,乍暖还寒。*STAR* 仅出两期,便偃旗息鼓。幸运的是我们得到以张浚生老师为代表的校领导的理解爱护,由陶松锐老师出面收编进入《浙大团讯》。紧接着扩版改刊,更名为《求是园》。陶松锐老师以校团委副书记的身份兼任主编,我被委以副主编的重任,负责编辑部的日常工作。

编辑部内群英荟萃,各路英豪各管一方。政论组由对政治十分敏感的洪钢领队,召集了周光讯、龚辉宏诸位大将。诗歌组由世家出身的李曙白负责,而大气豪爽的丁仲礼是骨干。他们两位历练丰富,妙笔生花。小说组组长是叶健勇,翩翩才子,少年英俊;副组长是陈大柔,静言含章,笔老墨秀。美术组组长是孙小青,潇洒倜傥,一表人才。我以散文为佳,该组就由我兼管。

编辑部的工作,平日波澜不惊,无非是组稿改稿,排版印刷。《求是园》虽有团委直属的官方身份,却更是文学青年的习作园地。除了一些校园报道外,主要发表文学作品。激烈的呐喊虽然渐渐远去,青春的热血还在默默奔流。静水暗澜之中,不时扬起几朵浪花。记得其中一次是陶先生与一位专事理论的故人论战,主题是人本善还是人本恶。引经据典,你来我往,交锋了好几个回合。陶先生禀性剽悍,观点鲜明,一时火花纷飞。

诗歌方面,印象最深的有仲礼兄以笔名丛犁发表的《啊,造山时期》和曙白兄的《短笛吹大海》。《啊,造山时期》大气磅礴,充满时代的气息,巧借地质专业的概念构建独特视角,将中国民主化过程比作造山运动,预言海中平凡的沙粒,必将崛起成未来的大山。满腔赤子豪情,令人过目不忘。《短笛吹大海》则诗情洋溢、意象优美、收放自如、技巧娴熟。我的诗作时代感强,加之朗朗上口,多次被校文工团选作诗朗诵之用。南腔十足的我,居然辅导字正腔圆的朗诵队,抑扬顿挫,自得其乐。今日想起,颇感汗颜。

小说方面,小叶(叶健勇)的作品以文笔细腻善于心理描写著称,是言情高手。这可能得益于他年纪虽小,感情生活却丰富多彩。我亦曾有一些短

篇小说习作发表,但常有主题先行之嫌。其中一篇《为了明天》被选中在《浙江日报》副刊转载,大致情节是一对学生情侣为了更好的明天,斩断情丝在校不谈恋爱,云云(汗颜)。记得当时《浙江日报》给了我35元稿费,这在当时可是一笔超过两个月生活费的“巨款”!

散文方面,常被大家提起的《中秋月》是刊登在STAR创刊号上的“成名作”。当时写的散文受杨朔影响较大,讲究以小见大,追求诗意笔法。杨朔散文构思奇巧、语言唯美,但格局不如刘白羽的宏大,行文不如秦牧的自然。以当年的年龄阅历、境界修养,自然难以效仿大师风格。记忆中与曙白等人参加学生干部青岛夏令营后发表的一组散文,包括《泰山日出》,在当时反响较大。

当年《求是园》办得风生水起,在理工科高校的同类刊物中独树一帜,成为浙江大学的一张靓丽名片。曾有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前来取经,更有考生因慕名本刊而报考我校,他们认为这是名校应有标配,而许多院校却付之阙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实至名归,怡然欣慰。

编辑部同仁活动——天目山之行,大家至今仍津津乐道。天目山东西两峰,峰顶上各有一池。池水长年不枯,犹如天目。此山峭壁突兀,峡谷幽深,古树参天,古迹犹存,是太湖水系和钱塘江水系的分水岭。登海拔1506米的西天目主峰仙人顶,一路上风光旖旎,引得各位妙语连珠。特别之处有三:一是我带了一架当时稀有的雅西卡双镜头反光中幅相机,留下了不少珍贵的历史照片;二是徐宙带了一杆气枪,大家玩枪习武难得放肆,还以白毛巾扎头,仿敌后武工队留影;三是此行除了编辑部诸位,还特邀校文工团的舞后花旦。当夜借宿山顶气象站,以便次日早晨看日出。一间空房,仅设两床,男女同学和衣而卧,谈天说地,直到昏昏睡去。此中轶事,传说颇多;往事如烟,难知虚实。青春的记忆纯真美好,每人都留下了自己心中的故事。

集体活动中印象最深的,是泛舟西湖险进局子。那是一个月圆之夜,大伙结伴去杭州剧院听音乐会。记得是一个美国乐团,演奏德沃夏克的《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散场后那雄浑的旋律还在心中激荡,余兴未尽,车铃齐鸣。众人沿着白堤回校,途经西泠印社,但见湖边柳树,缆系游船。一时兴起,解缆荡舟,直奔湖中。欢声笑语,谈笑古今。三潭印月,月满湖心;阮墩荡舟,桨散灯影。俯仰之间,更深夜阑。兴尽回舟,翩翩颺颺。回舟泊岸,